「真相的稜鏡：轉型正義工程」

學術研討會

「追尋真相的實踐價值：
轉型正義工程的展望與未來」

圓桌論壇逐字稿

主持人—許有為：

前面的一個專場。那我們知道轉型正義基本上就如同早上陳俊宏老師所談的，唯有，一個國家唯一有民主化，才可能開啟轉型正義的契機，那可是民主化並不保證轉型正義的順利實行，那講到民主化，我想要現場請教一下各位，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除了我在東吳兼課的學生以外，我上課提過，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憲政秩序之下，所有憲政機關它的民主正當性全數是來自於臺澎金馬部署及相關島嶼的人民的日子是哪一天？

聽眾 1 — 女：

人民投票選擇。

主持人—許有為：

不是，司法院所頒，司法院當時第一次直選總統是 1996 年 3 月 23 號，當時的司法院還是第六屆大法官，第六屆大法官提名他們的是，1992 年的時候由總統來提名，那個時候的總統還是由老國代為主的國民大會所選出來。所以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全部的五權加上總統、副總統、國民大會，所有的這一些重要的憲政機關，所有他們的民主正當性全數是來自於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國民，沒有，我相信沒有。揭露答案，答案是 2003 年 10 月 1 號，為什麼？因為這一天，第六屆的大法官全數退職，然後由臺灣人民，所有臺灣人民，這臺灣人民是包括臺澎金馬，臺灣人民選舉出來的總統所提名，由全體臺灣人民所選出來的國會通過而任命的大法官就職的日子，所以當我們在說一個國家唯有民主化以後才開啟了轉型正義的契機，但是民主化並不代表轉型正義的順利實施，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那尤其是說放在我們的國家，我們轉型正義相關的法治，比較系統性的制定出來，甚至於是一直到 2016 年第三次的政黨輪替以後，也就是首次的國會全面翻轉，全面國會的多數黨，有另外一個政黨來擔任的時候，才有了這個機會，對於轉型正義的相關法治，做一些比較系統性的闡述。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從 2016 年第三次的政黨輪替以來，我們的轉型正義工程如果從那個時候開始算，到現在也六七年的時間，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藉著這個機會，我們邀請到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處長，賴俊兆處長，以及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徐偉群徐老師，以及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黃丞儀研究員來跟我們一起座談。我們談的主題就是展望，對於轉型正義工程的展望與未來，同時在展望與未來之前，也包含對於截至目前為止，我

們國家在轉型正義工程的成果的盤點，以及問題的盤點，還有我們可能要請三位貴賓，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們個人對於轉型正義的一些針砭。那接下來我就把時間讓給我們第一位來賓賴處長，賴處長請。

與談人 1 — 賴俊兆 Semaylay i Kakubaw :

主持人許委員、與談人徐老師、黃老師、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受黨產會之邀參與本日研討會。本場次為最後一場圓桌論壇，主持人許委員已將本場次主要討論議題介紹得很清楚，參考主辦單位會前提供的提綱，希望論及國家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現況，今日代表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分享及說明，主要是目前推動情形的盤點，或許尚有不足之處，也期待稍後討論，可再多聽取與會老師及先進的指教。

今日與談本人預備的簡報標題為「從促進到落實：推動轉型正義的國家任務」。回顧我國現有主要的轉型正義法規，即 2017 年底立法通過的促轉條例，在當時轉型正義工程是以較為系統性、體系性的人權觀點促進及推動，使整個國家乃至於社會大眾，可認識到轉型正義對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必要性。但從促進到落實，必須注意到 2022 年促轉會工作告一段落後，目前實際上政府各部會在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是以落實推動角度，將轉型正義轉變為長期性、全國性且必須全面推動的國家任務。本人今日即以此觀點，分享目前政府如何看待此項國家任務。

分享內容主要分為 4 大部分，第一部分針對目前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分工的整體圖像說明背景；第二部分針對現階段推動的情況，包含從 2018 年促轉會成立，到 2022 年促轉會任務告一段落，緊接

著到目前為止一年的時間，包含行政院設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由主要 6 部會推動轉型正義相關工作的現況盤點；第三及第四部分則是政府未來對於轉型正義中長程推動規劃及未來展望。

一、政府推動轉型正義整體圖像

第一部分有關政府推動轉型正義整體圖像，去年 5 月促轉會完成階段性任務，第 4 頁簡報即促轉會當時對於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背景說明，從 1987 年解嚴開始，官方陸續表達歉意，並進行補賠償工作及檔案整理。但較系統性推動其實是在 2016 年後，從最早 2016 年黨產條例立法通過，接著 2017 年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促轉條例立法通過，促轉會 2018 年至 2022 年 4 年任期也完成許多執行面及整體國家相關任務的規劃，並於去年 5 月提出任務總結報告。以上為臺灣推動轉型正義進程，常聽到學界或民間提及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較其他國家起步相對較晚，而若從 1987 年解嚴時點觀察，確實延約 30 年始有系統性推動，所以做法上或與其他國家有不同之處。但去年 5 月促轉會提出任務總結報告的同時，也擬具促轉條例修正草案及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受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以下簡稱權利回復條例）草案，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因此促轉會解散後，政府在處理轉型正義國家任務的推動架構，是由行政院任務編組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由院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含副院長、秘書長、督導轉型正義的政委及主要 6 部會均參與其中，同時借重民間力量，邀請民間委員參加。在院級任務編組下，帶領法務部、內政部、文化部、衛福部、教育部及國發會等 6 部會，分別負責各項轉型正義任務。黨產會則為另外的獨立機關，同樣繼續處理不當黨產；另外尚有內政部輔導的 2 個財團法人，分別為二二八基金會及去年因權利回復條例立法通過授權設置的權利回復基金會，

以及文化部轄下負責處理轉型正義有關的人權教育、不義遺址等工作的國家人權博物館。

二、轉型正義現階段推動成果

進入第二部分，目前在 6 個主要部會承接轉型正義任務情況下，其中平復國家不法部分由法務部承接，累積平復案件已超過 7,000 件，包含促轉會時期平復將近 6,000 件的司法不法，以及法務部接手後，今年 6 月也進行第二波公告，兩波公告合計平復超過 1,000 件。特別在去年促轉條例修正，將行政不法納入平復國家不法範圍，目前由法務部組成的「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持續推動平復國家不法工作。

處置威權象徵部分則由內政部承接，近期內政部也邀請相關的中央及地方機關推動這個在促轉會時期就面臨困難與挑戰的工作，雖然現行促轉條例明文規定威權象徵應予以移除或其他方式處置，但法律規範的宣示在執行時有其難處，故目前尚待處置者相對龐大，較為大宗者如國防部、教育部、退輔會所業管尚存眾多威權象徵仍待處置，內政部目前也透過發布補助作業要點或研修法制方式，希望使威權象徵處置能有更明確的法律依據，以要求相關的中央或地方機關在執行面上配合，如此較能有所進展。

受害者權利回復部分，由依權利回復條例成立的基金會逐月通過賠償案件的申請，截至今年 6 月累計賠償 276 件，目前受理件數龐大，相信賠償進度將越來越有所進展。

政治檔案研究部分，主要由文化部所屬國家人權博物館負責，該館已出版政治檔案相關研究成果，包含今年 2 月出版陳列前輩的《殘骸書》，或陸續規劃出版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等

專書。另外在轉型正義資料庫部分，因法務部處理的國家平復不法範圍擴大，以及持續新增案件，所以在轉型正義資料庫維運上，也有待國家人權博物館後續更新上網。

另文化部同時負責保存不義遺址，在促轉會時期曾審定 42 處，文化部承接後，因尚有法制化工作，審定事宜待法制化完成後持續進行。以指標性個案安康接待室為例，去年 12 月取得新北市市定古蹟文資身分後，後續規劃預計今年 7 月辦理簡易維修，並於今年 10 月、11 月間逐步開放預約參觀。整體性的安康接待室文資審查及修復，預計 113 年 3 月就整體修復再利用計畫送文資審議通過後，按相關計劃進度推動。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部分，由衛福部承接，主要也是承接促轉會先前對於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政治暴力創傷的照顧療癒工作，包含開設新增服務據點。而衛生福利部今年申請促轉基金的計畫，也特別針對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的照顧方案進行示範。

轉型正義教育部分主要由教育部推動，所涉範圍不只限於學校教育，尚含一般公務人員，甚至如司法、軍警情報等特殊公務員，均為轉型正義歷史進程重點機關。今年 2 月由教育部草擬、行政院核定實施的「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為 4 年期計畫，現階段有關學校教育、公務員教育或司法、軍警情報人員教育，乃至於一般社會大眾教育，均在此「教育行動綱領」框架內分年、分期推動。教育部也為此將其「人權教育資源網」擴大為「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資源網」，後續訂定之指引及相關教育資源盤點也會建置於內，供機關、學校或民間單位運用。

政治檔案徵集及開放應用部分，從促轉會時期即由國發會檔案局負責，該局已陸續徵集政治檔案，特別在 2019 年政治檔案條例

公布施行之後，徵集典藏的政治檔案長度已達 2.7 公里，因此政治檔案的開放應用也是目前任務重點。另外補充較待處理的部分即政黨政治檔案，在促轉會時就遇有蠻多挑戰，檔案局在這部分仍持續努力當中。

最後有關促轉基金的設置運用，這部分也是由檔案局處理。去年成立基金管理會後，透過此一特種基金，中央各部會均可運用該基金推動轉型正義或相關人權教育，甚至在符合促轉條例明定用途下，可運用於其所職掌業務項目。補充說明去年基金甫成立，經費較多運用於政治暴力創傷照顧療癒，約 600 萬餘元，但去年各部會提報今年 112 年促轉基金運用，申請經費為 9,031 萬餘元，且規模將持續增加，各部會提報明年 113 年申請經費已達 1.5 億元，以上金額仍待立法院預算審查。透過黨產會收回的不當黨產，挹注到促轉基金，可供政府機關或由機關補助民間，運用於轉型正義教育、人權教育等轉型正義相關事務使用。以上說明較為繁複，主要是希望藉此機會使社會大眾瞭解政府相關部門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現況。

三、轉型正義工程中長程推動規劃

第三部分說明去年促轉會任務結束後，主要由 6 部會承接轉型正義任務，在組織架構上勢必有所變化，原本轉型正義工程由二級獨立機關促轉會負責，優點在於事權統一，工作推動或行政溝通效率也較為迅速，但促轉會為任務型組織，在相關的規劃任務達成之後，依法須告一段落，因此重點在於後續的落實與推動。去年 5 月之後，由稍早所提 6 部會各自負責 1 至 3 項轉型正義任務，因此在各部會推動業務下，如何有整體性觀察而不會見樹不見林，便成為

亟待解決的問題，故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除作為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的幕僚單位外，也包含部會間的協調、連繫、統合工作，希望能多扮演積極的角色。

在此提及的「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草案)」，主要參考部會推動的現況，包含困境或較為不足之處，以及近期徵詢學者專家意見而得，希望用整體性觀察角度擬訂中長程業務推動規劃，為 112 年至 115 年的 4 年期規劃，而每年規劃的進度尚可滾動檢討。推動策略除由行政院統籌督導外，也希望依據業務的實質範疇，融入部會目前推動工作。另一部分也希望透過法制化健全相關工作的推動基礎，在此規劃中之架構圖即參考聯合國轉型正義策略，希望納入轉型正義各要素，據以提出 3 個主要目標，包含「還原歷史真相，反省集體記憶」、「矯正政府過錯，弭平社會傷痕」、「鞏固民主體制，深化人權價值」。這 3 大目標對應國際標準，同時也直接對應各部會目前推動的業務，簡報第 20 頁可看到 6 部會負責的各別業務項目，均可對應國際標準及目標。雖目前仍為草案，但預計近期將發布實施，實施後以此規劃架構，由各政府部門提出 4 年內須達標的工作重點，並配合相關監測指標及分年推動事項。希望透過此一中長程規劃架構，各部會較不會迷失在其負責的細項工作之中，並且可以具體提出 4 年內希望達成的重點及指標、每年預訂達成之進度。

四、轉型正義工程的展望與未來

最後提到轉型正義工程的展望與未來。如前所述，促轉條例在 2017 年底制定，去年因應促轉會任務告一段落，所以進行部分修正，主要處理促轉會解散後相關業務的承接。而在今年初行政院

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開始草擬「國家推動轉型正義法」，亦即促轉條例全文修正。此舉非一時興起，起因於促轉會去年5月提出的任務總結報告，其中第四部即為促轉條例全文修正建議，在此參考基礎下，經過一年以來各部會實際執行情況，也體認到法制工作對公務部門而言，為依法行政原則的基礎，例如威權象徵處置即面臨執行面欠缺法律規範的困難，且不以此為限，其他轉型正義任務法律規範密度亦須有所提高，故有促轉條例全文修正的相關討論與研議，並且在今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總統也宣示希望轉型正義相關法案能在一年內完成立法。而健全轉型正義法制工作除促轉條例全文修正外，也包含修正政治檔案條例及擬訂保存不義遺址專法，此外尚有中正紀念堂轉型涉及相關組織法的修正。以上均為整體法制工作所需處理法案。

以促轉條例作為轉型正義最主要的根本性規範或基本法定位而言，目前促轉條例全文修正方向，希望能以整全性視野、國際觀點出發，故規範範疇將以目前國家推動轉型正義任務所要處理的所有面向，透過提高法律密度方式，在全文修正草案內有所規範。目前擬具的修正草案已細緻規範至個別任務的具體事項，例如國家不法平復在前次修正已有相關規定，另外在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威權象徵處置、轉型正義教育、促轉基金設置運用等任務，也都希望能夠在此全文修正草案內有所規範。由於主要的基本原則與立法的重要準據將規定於促轉條例，同時搭配的其他個別專法，例如政治檔案徵集與開放應用、受害者權利回復、加害者處置及不義遺址保存，即在促轉條例外另訂作用法處理。

其中，國發會在今年3月已將「政治檔案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至行政院審查，這部分因各界多所關心，包含立法院蠻多立

法委員都有提出相關版本，希望朝「最大開放、最小限制」修法方向能有更多調整。因政治檔案條例現行規定較常遇到的障礙為囿於國安機密而限制應用，故於本次修正將朝符合外界期待方向處理，且一併配套修正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規定，針對涉及國家機密的政治檔案，作有別於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因此包含永久保密將調整為定期檢討，特別針對政治檔案條例第 8 條第 2 項第 2 款影響國安或對外關係的內容遮蔽，也將作最小化限制。另外在監控類政治檔案，也將增訂相關配套規定，較著重於個人隱私的保障。該草案尚在行政院審查，希望能在近期內提出。

另外，文化部今年 4 月擬具「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規範內容主要參考促轉會時期提出的建議，與文資路徑脫鉤處理，使不義遺址有更明確的法律地位。此專法亦將規範不義遺址相關調查、研究、修復、規劃、管理維護及審議機制，並且特別著重於公有不義遺址，課予其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提出保存計畫等較高義務。該草案目前也尚在行政院審查中。

目前政府處理的相關法制工作，包含與大家說明的促轉條例全文修正，希望使其成為落實推動轉型正義國家任務的整體方案，目前法案擬朝「國家推動轉型正義法」之名提出。另外政治檔案條例、不義遺址保存條例及法務部目前研擬的加害者識別處置專法，都希望能在轉型正義整體工程之中，就法制化部分能有較為具體明確的依據。

今日研討會關注的還原歷史真相部分，在目前 6 個主要部會承接轉型正義工作架構下，某些部會也會涉及還原歷史真相任務。舉凡國發會辦理的政治檔案開放應用、文化部辦理的不義遺址保存，甚至法務部辦理的平復國家不法或未來透過加害者專法辦理處置、

究責事宜，均需以個案歷史真相為基礎推動。但目前在整體還原歷史真相工作上，有在思考是否在促轉條例內規範設置專責機構。具體而言，在現行某些部會處理個案所涉歷史真相還原以外，若有較為體制性的歷史真相還原，如促轉會針對重大爭議個案如林宅血案、陳文成案公開相關報告，或於任務總結報告披露整體壓迫體制、監控體制，這部分是否需要設置專責機構處理，目前尚在討論、溝通及研議之中。

整體轉型正義工程的展望與未來，大體可用簡報第 28 頁的圖說明。整體核心會在促轉條例全文修正的「國家推動轉型正義法」，此外搭配既有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相關的補賠償法規含去年通過的受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以及黨產條例，右邊紅字部分則是正在規劃研議中的政治檔案條例、加害者專法、不義遺址專法及中正紀念堂轉型搭配的組織法。這是目前在轉型正義工程特別著重在法制，認為如此較可使轉型正義工程能有更清楚的法律依據，同時明確化推動、落實轉型正義任務的國家義務，一旦建置完成，在比較完備的法制基礎下，不管是公部門或民間，就會更清楚看到轉型正義相關工作的推動，對公務機關而言，則成為法定任務，也是義務。同時也回應今日研討會前面場次與會者提及的司法院釋字第 793 號解釋及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均反覆提及轉型正義的推動落實，乃是確立深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憲法所要求，或肯認其為國家必須推動的重要工作。

本處負責人權與轉型正義工作，這兩項工作均由院的專責單位負責，兩者連結應相當清楚，轉型正義所處理的，即過去威權政府曾經侵害人權的事件如何看待及平復承認，以避免再次發生，相關工作陸續透過各種方式，不管法制面或行政溝通協調，也借重民間

社會力量，包含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民間委員，以及學者專家的提醒與建議，也持續納入本處後續工作的推動。

剛才已說明目前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的相關資訊，更詳細資訊若有興趣，均可至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網站瀏覽。該會報雖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間隔期間看似較長，但去年 9 月及今年 3 月兩場會議，均就重要政策推動有所指示，例如前面提及的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中正紀念堂轉型，均有提出具體作法及方向。先說明到此，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賴處長帶給我們很精彩，而且完整的這個報告。我常常在講，黨產會雖然處理的也是轉型正義的議題，不過我們站在黨產會的立場，往往來看待轉型，整體的轉型正義工程，其實有點以管窺天，有點說瞎子摸象太難聽了，但是就是有點，因為我們侷限於我們的專門的業務就是處理不當黨產，我們很高興今天在從賴處長的這個很精彩完整的報告裡面，看到我們國家對於這個轉型正義工程，截至目前的成果，我們也很謝謝賴處長在他位置上，為國家轉型正義所付出的努力。那麼接下來是兩位學者，是徐偉群老師以及黃丞儀老師，他們兩位從他們在學術界，兩位學者對於我們國家轉型正義的這個工程，也站在他們的位置上，默默的進行了多年，很無私的奉獻。所以我們今天想邀請兩位來跟我們談一談，我們國家轉型正義工程截至目前，盤點截至目前的成果，碰到的問題以及問題的解決之道，對於未來的展望，我們首先歡迎徐偉群老師來為我們講解，徐老師。

與談人 2－徐偉群：

兩位與談人，各位先進。應該講說在學術上我並不是轉型正義的專家，我只是因為一些機緣的關係，曾經參與過促轉會的工作，我也只能就我參與的這個經驗，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在今天的這個提綱裡面有包含了，對於過去政府的轉型正義工作成效的評價，我自己覺得我不適合談這件事情，因為我曾經有參與過一些工作，評價應該留給別人來評價這樣子。我今天能夠談的，應該是我自己對於接下來轉型正義要怎麼走的一些想法看法，那有不少地方是跟剛才賴處長的這個，跟大家的報告有關係的這樣子。好，簡單說我認為那個下階段的轉型正義的工作，分兩個層次來看，第一個是這個轉型，國家就是轉型正義的工程需要的基礎條件，然後才是個別任務。基礎條件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法治，另外一部分是人員。就法制的部分，剛才處長其實已經有提到，我們自己在促轉的這個後期的工作之一，就是去規劃促轉條例的全文修正跟方案這樣子。

我離開促轉會之後，你來問我說，你接下來的工作要做什麼？我自己也會認為首要的工作就是完成法制的工作。不是因為我是學法律的人，而是這樣說，我覺得在這個轉型正義的法制工作上，我們不認為它是一個充分條件，它不是一個國家會去實踐轉型正義的充分條件，但是它是必要條件。它之所以是必要條件，是因為一個完整的法制，它可以幫我們界定清楚國家轉型正義的任務到底有哪些。第二個，透過法律的規定，賦予國家機關一種法定的義務，要去完成這些任務，那有這些法定的義務的意義是什麼？就是當某個機關承接了法律上的義務，那麼他接下來就要受到課責，在民主政治之下，它可以成為一個課責的施力點，這是這個第二點。第三點就是說法律的規定本身可以當作一種指引，也就是當我們的法律規

定夠精緻的時候，承接任務的機關它就不會限於它不知道頭緒何在，它會有一個方法可以遵循，這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就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促轉條例的全文修正，包括它的名稱的修正。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人員，這個人員我們的，我要談的是在離開促轉會之後，偶爾還會接觸到這個國家機關的轉型正義的工作，我的體認這樣子。那就是人員就是轉型正義工作要靠的是人去做，尤其是我們現在把這些任務，分給常態機關之後，常態機關的公務員對於轉型正義的認識和意願這兩條條件，是國家能不能夠真的往前走的必要的條件。但是要講到認識跟意願，我認為還更重要的是往上追溯，也就是一般的公務員對於轉型正義的認識跟意願，取決於首長、主管，和高階公務員的認識跟意願，尤其是首長，我可以取決於很，我就直接講清楚的例子。就是以文化部來說，在我們的構想裡頭，文化部要承接的是不義遺址的保存的這個任務，那麼這個現階段文化部，應該說從促轉會結束之後，文化部要做的工作應該是首先要去制定一個法制，但是很明顯的是，文化部部長，前一任跟現在這一任的態度，使得不義遺址的法制的這個建立這件事情，發生很大的轉變

這個我就直說，在前一任部長就是李永得部長任內，他很顯然是的不想要推動轉型正義的任務，我就明白說。那他們，在他的志向，他的局處去為了這個法制的建置去推委託案，我去參加委託案的諮詢，那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就是承辦的這個單位的公務員，他對這件事情就是完全沒有認識，而且沒有什麼想到，就是當作一個重要的任務。那所以這個委託案後來的結果是，他好像本來要推，本來要建議要訂這個專法，有一說是要跟文資法要區別，但是一開始的就是在那個委託案之後，我們聽說是在踩剎車，不要專

法，要在文資法下去設這個修某些條文這樣子。這跟當時諮詢會議的時候的專家的意見都相反，也跟委託這個案的這個承接這個團隊的意見也相反。但這件事情後來發生大轉變，就是文化部長換了一位，好，那現在的文化部長看起來是有這個意識的，也有這個意願的，所以後來我就很驚訝地發現說，文化部已經著手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去擬訂了這個不義遺址保存的專法。

我們本來想法是說，促轉條例要做全文修正，每一個任務都必須要法律化，所以本來想法是如果不義遺址，例如不義遺址，它沒有辦法有這個專法出來，那就應該要在全文中去訂定，但是現在看起來不義遺址的專法的進度是有跟上。那我要講的就是說，那因為首長本身的這個認識跟意願，會決定這個部會承接法定任務的部會他做得好還是不好。而這件事情就是首長的任命，基本上就是政治決定，所以未來的這個轉型正義工作的命運，一定是從上面開始要有做這件事情的政治意願，然後再做首長的選擇的時候，也要去選擇那個有意願的首長，然後層層下來，他才有可能帶動，就是非一線公務員的行動。我必須說我接觸到內政部的公務員，為了這個，假如說威權象徵的清除的問題，其實不是基層公務員都不願意，不是，只是有些人基層公務員他是有意願的，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如果首長說要做，那他，我想有一些公務員是很願意去聽到這個專家的說法，去往前走的。但是如果首長沒有這個意願，那後面都不太會發生

當然除了意願之外，還會需要有認識跟能力，確實在我們現在的公務體系裡頭的公務員，基本上都沒有這一個，這一方面的認識跟經驗，所以該怎麼做常常會覺得沒有頭緒。所以在這種，在這個情況下，人員會是需要培訓的。那除了培訓之外可能也需要補充，

所謂的補充就是會需要從一般公務員體系外去找到有這一方面能力或知識經驗的人，約聘進來，來參與這個工作，這可能是必要的。但如果要說這樣做，就表示國家要花比較多的錢，然後那個人事的這個制度要打開這個門，但如果不這樣做，我覺得後面要推動是難的，這是關於我認為的這個兩個基礎條件。

那再來就是說，接下來就是個別的工作，個別的工作我想要提醒的第一件事情是說，這些由常態機關所接任的個別工作，接下來要避免的是瑣碎化，也就是說最後變成例行公事的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的處理，但是它那個真正的目標或意義不會被彰顯出來。所以要避免瑣碎化，就表示說這個國家必須要去彰顯，在國家反省之後的這個關於過去的威權統治，不義或不法的敘事，也就是後面要講的那個還原真相的事情。所以確實會需要有一個國家機關要擔起這個，要做從國家的角度來反省不法，然後做成的這種大趨勢。那這就涉及到剛才，就是說這個處長談到的，比較含蓄談到的，他所構想的一個專責機關，當然這個專責機關還要做到這件事情，需要相當的權責，包括他要有調查的權利，他才有辦法得到資料，要包括他要有敘事的專業，所以它裡面的人員會需要有專業的人員在這裡。再來就是他們要做這個揭露，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到底哪一個機關來擔當會是一個問號，因為目前看起來常態機關裡頭，有專業又願意擔當的，又有那個調查權的機關，好像不太容易數出來。我想可能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所以在這個人轉處這個地方有一個想法，就是想要去成立一個專責的機關這樣子，我想是因為這個緣故。

好，那這就是剛才講我所說的這個，我覺得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瑣碎化，要能夠彰顯國家反省的敘事。那除此之外，有個

別的工作，就目前的情況看，我所得到的資訊，我稍微做一點評論好了，就剛才講到那個政治檔案的問題，那除了法制的問題之外，我的理解是政治檔案的徵集跟審定的進度，到目前為止是相當有限、相當有限的，就是它的進展是非常有限的，這當然是跟承接這個任務的國發會檔案局，他們對於這個工作的想法，那不可否認就是把這個政治檔案的徵集跟審定的工作交給國發會檔案局，對於檔案局的這個，就是公務同仁而言，那個工作的形態是很不一樣的。因為要做檔案的徵集跟審定，會要去行使權力，而且這個權利可能還要蠻強的權力。那這個也許是這個機關或單位過去沒有的這個經驗，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所以目前看起來是一個沒什麼進度，尤其是掌握在國民黨手上的這一些政治檔案。剛才處長有提到促轉會，其實促轉會在我們的任內，是有做一些具體的行動去向國民黨要檔案的，最明顯的就是有一批檔案放在政治大學，那我們就採取了這個行政行為去封存它，然後經過正當的程序，最後把它收為國有這樣子，還為此有一些爭執而進行了訴訟這樣子，那這是要去做的。那我們在促轉會結束之前，知道國民黨實際上手上還有很多的資料，從一些線索來看，譬如說海工會，那個過去海工會在海外監視在海外留學的人，那個檔案是非常多的，但是現在檔案在什麼地方？我們不知道，但是需要去要，需要去要就要動用公權力，那在這一點上看起來目前是沒有進度。

那再來我談一下那個加害者究責，剛才處長有談到這個法制的情況，各位如果注意到的話，加害者究責的法制目前是沒什麼在動，那這個工作是交給法務部，但是法務部到目前為止，就我的了解是還沒有產出這個的草案。那我猜想，因為對法務部來說，這是一種挑戰，比平復國家司法不法，平復國家行政不法更尖銳的挑戰。但是如果加害者究責本身是轉型正義的工程之一，那接下來這

項任務的機關就應該要去做，我們的心理狀態就要有所改變，有所調整。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從我的立場來看，如果法務部沒有真的去產出一個那加害者究責的專法，那麼行政院這個地方應該要考慮，在促轉條例的全文裡面就用專章來處理它。我們促轉會不是我們有留下這些這個專章的條文，有的，我們有留下轉章條文，那就是提供給人轉處參考。

那再來就是威權象徵，那我最近也有機會去內政部開過會，他們想做一個威權象徵這個如何處置的一個模型這樣子，就是用一個專案去跟中央跟地方去協商如何處置。但是碰到了一個困難，這個困難就是法制還不具備。當法制不具備的時候，你沒有一個法律的工具在後頭作為你的這個權利行使的根據，那麼地方政府有可能是因為不願意，或他背後覺得沒有社會支持，所以也不太願意就是配合，所以法制變得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會需要去處理中央跟地方的權責的問題。那當然中央本身還有很多的問題，包括國防部就是在這一塊還很難觸及，包括總統府可能也不適法，所以威權象徵是一個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的一個工程，那也因此承接這個工作的機關的首長，就要好好的選擇，就是會需要有勇氣承擔起這種政治任務的人這樣子。那再來關於的是，再來可能是不義遺址，那不義遺址剛剛已經舉過，談過了，那現在看起來至少在現任的文化部長任內，看起來是可以有點進展。我還有多少時間？還有一分鐘？差不多了。那至於創傷療癒，那我們得到的資料比較少，不知道它在衛福部那邊進行的怎麼樣，其實這會需要很高的專業投入在裡頭。而且創傷的路應該是一條和解的路，是一條重要的和解這樣子。

好，那最後談一下權益的恢復，就是剛才前一場連先生所，連先生好，對，好。有提到的這個那個財產維護的事情，但是其實

連先生所提到的這些財產返還的問題，他的困難都在於當初這個權益恢復條例在擬訂的時候都已經跑過一遍了，那相當程度的那些條文的回應就是這些困難。然後說到那個，所以現在比較難的問題是跟時間賽跑，跟時間賽跑，它因為有它會需要大量的人力這個的投入，但是就我所知，現在的權益恢復基金會要找人還是找不完成，因為這個工作並不是很好做，所以情況大概是這樣子，以上是我的一點分享。

主持人－許有為：

那我們謝謝徐老師，很精彩的分享，很系統性、完整性地告訴我們，我們目前就是我們來展望未來國家的這個轉型正義工程，那在展望之前，我們目前為止所碰到的一些問題。那我們再次用很熱烈的掌聲，謝謝徐老師的精彩演講。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請黃老師，來跟我們分享黃老師對於這一些議題的高見。黃老師。

與談人 3－黃丞儀：

謝謝主持人。前面兩位與談人，徐偉群老師曾經是促轉會委員，處長現在在政府部門工作，我是完全沒有政府的背景，所以我講的內容可能跟前面兩位也不太一樣。但是反正既然是座談會，就是大家意見交流。我要提醒的就是，不要過度迷信法制跟權力，我說的是 power。

臺灣的轉型正義其實在國際的評價上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金錢補償，大概是所有從事轉型正義國家裡面發出最多補償金的。照剛剛處長所勾勒的圖像，未來臺灣轉型正義還會有一個國際特色，就是我們的法律數量可能也是最多的。我非常能夠了解，政府部門在推動各項的政策，或者是在執行的時候是需要有法制依據，

這也是長期以來，我國公法學，從民主化之後的結論就是要依法行政。

我覺得，依法行政對我們的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箝制，跟一些對於法治的誤解，或許主持人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但是這件事情今天我就不細論。如果什麼事情全部都要靠法律才能夠做得到的話，轉型正義也可能被另外一群人視為透過法律來遂行的國家暴力，那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去思考，法律的作用是什麼？法律的目的是什麼？不是說拿到法律就有一把劍，有一個令牌護身說我現在就有這個法律，我可以去拆這個銅像。對，你有這個權力可以，因為你現在取得國會多數，所以你有這個 power，通過法律，賦予這個權力去拆除銅像，可是轉型正義要的是什麼？其實是希望社會可以更了解，更了解用「法之力」（force of law），用哲學家班雅明的這個說法，法律的暴力性去推動這樣的一件事情，最後恐怕是沒有辦法真的讓社會的其他人，去了解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可能其結果正好跟轉型正義所追求的目標「理解、和解、民主鞏固」是相違反的，會讓另外一群人覺得，今天我政黨再次輪替，拿到國會以後，再拿到行政權以後，我就可以把它翻轉過來，你通過了這些法律，我一樣可以透過國會多數的方式把它終結掉。但是這行政部門就不要再執行了嗎？如果我們今天轉型正義的工作是繫於國會通過的法律，有國會通過法律我才要做，那很簡單，國會多數形成一個非民進黨的聯盟後，就是不通過今天行政院人轉處提出的法案，或其他部會提出的這些法案，轉型正義工作在臺灣就推動不下去了？會不會有這樣的結果？這樣子就會造成轉型正義，變成是政黨之間在競爭跟鬥爭的工具。這也是我們對於這幾年轉型正義的推動，感到憂心跟不安之處。

一方面我們固然可以認識到，國家需要在法律的層次去肯認過去的錯誤，我們已經有大法官第 793 號解釋，也很高興大法官不只是在 793 號，在今年（2023）的憲判字第三號繼續認定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是黨國體制。換言之，國民黨在廢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前是憲法院認證的黨國體制。但這一套憲法論述，我們的社會接受了嗎？我們社會普遍的認知到國民黨的統治本質是什麼嗎？憲判字第三號有一個很深入的分析，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他在討論國民黨對於臺灣社會的控制，它的重點是在處理黨職轉公職的這個部分。在黨職的這個部分其實有很多是社會組織，所以大法官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去討論國民黨如何透過組織布建來控制臺灣社會，從農業、漁業、工業、教職等等的領域去布建組織，然後遂行它的社會控制。這個描述其實是一個很深的，基於歷史研究發現而得來的法律上認知，但是這樣的一個認知，我們透過法之力，透過大法官之力，憲法法庭認證的效力，有沒有在社會上產生任何一點的討論？沒有，沒有任何一點討論。

大家可能覺得說，大概就是因為法律的東西很無聊，所以沒有人會去關注，連法律人之間也很少在討論，大法官怎麼樣去運用歷史研究的成果，去認定不只是黨國體制，還包括社會控制面向。除此之外，促轉會公布了任務總結報告，社會上有沒有在討論？促轉會對於國民黨當時統治特性的定位，有沒有人再在討論？轉型正義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一再的說，不管你是在南非、在拉丁美洲、在東歐都一樣，它是在帶動社會討論，你如果沒有辦法捲動社會去討論，那是不可能啟動整個社會進行澈底的反省，那就會變成你用法律去強迫別人接受你所要的東西。我今天是因為國會多數，所以我通過這個法律可以去徵收國民黨土地、財產和檔案，我可以去要求中國國小的教育。可是，轉型正義真的就會因此落實了嗎？

我們一再的說，轉型正義需要一個整體的圖像，要有清晰的目標，並不是說照這個促轉條例裡面說的，要先檔案徵集，然後要做威權地景，然後還有司法平反，然後第四個呢？第四個單飛了，變成黨產條例，本後來把它轉化成心理療癒。結果法條規定的四項工作變成部門化，此後在討論轉型正義的行政任務跟國家工作時，就按照這樣類似教科書的四大 categories 一個一個去檢查。可是轉正義真正重要的是，臺灣社會到底怎麼樣去面對國民黨？怎麼樣面對威權統治的遺緒？國民黨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歷史問題，這就像當初納粹給德國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歷史問題一樣，這是後來民主的德國要去回答的問題。那今天民主化 30 多年之後的臺灣，如何去回答國民黨之於臺灣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去回答，共產黨之於臺灣是什麼關係？因為其實當初國民黨迫害的很多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今天不管是在促轉會的任務總結報告裡面也好，或者是未來要推出的種種法案裡面，都沒有正面的去回應中共地下黨員的問題。當初國民黨針對這些中共地下黨員刑求，進行不當審訊等，這些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措施，有沒有正當基礎？

臺灣社會長期以來都籠罩在國民黨主張的論述：「為了要保臺，所以必須犧牲個人權利」，國民黨不斷地提出類似革新保臺的說法。在 1950 年代初期，所謂政治壓迫都是為了臺灣未來的安定發展，甚至說壓抑政治人權，先讓大家富起來，從事經濟建設，十大建設等等，讓人民對於迫害噤聲。「臺灣錢淹腳目」，類似的經濟論述解消政治壓迫，今天要怎麼去看待？這些問題其實長期以來就不斷在臺灣民間社會裡面，去抵消轉型正義的論述。第一個革新保臺，第二個經濟發展。甚至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臺灣民主化是由蔣經國來推動的，如果不是蔣經國在他最後幾年決定解嚴，臺灣

不可能有民主化。這樣的論述我們怎麼樣去回應？

所以我剛剛要講的就是不要只著眼於法制面，變成部門化。剛剛徐老師也提到瑣碎化，見樹不見林，轉型正義很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要去回答這些歷史課題。政府很容易可以透過法案的數量，發出去的補償金數量，來搪塞過去，說我已經做到轉型正義了，不然你要我做什麼？可是你沒有回答最重要的問題，臺灣人心中都想要知道的，到底怎麼評價國民黨？怎麼評價共產黨？怎麼評價國民黨推出來的革新保臺論述，經濟改革論述，蔣經國是民主推手的論述？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思考的簡化跟偷懶。

要講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要從軍事審判法的改革開始講起（釋字第 430 號解釋），要從臺灣進入民主化之後，大法官透過各號解釋，包括大家經常提到的釋字第 567 號解釋以及各號和言論自由、集會結社有關的大法官解釋去談，到底臺灣所謂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是什麼東西？它不可以被抽象化，變成脫離臺灣歷史的，類似自然法的東西，直接強加在臺灣的法秩序上面。沒有，它是伴隨著臺灣民主化這 30 年來的，這個歷程，才逐漸長出來的。它跟廢除刑法 100 條在一起，它跟修改軍事審判法在一起，它跟老兵返鄉運動有關，它跟許多言論自由、集會結社的案件有關係。如果沒有讓人民從這樣一個歷史裡面去看到，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是我們這個社會滋長茁壯出來的東西，他可能就會把它理解成又一個舶來品，一個從德國繼承來的觀念，跟臺灣社會有什麼關係？

我們念茲在茲、一講再講的就是，轉型正義必須跟社會溝通，跟社會對話，而且是跟我們的歷史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它不是直接拿了一把尚方寶劍在那邊揮說，好，今天就是要照我的意思這樣做。那回過頭來講，包括檔案的徵集也是，我們必須要求各機關去

整理，去清查，那甚至要提到政治檔案，但是政治檔案徵集來了之後，要怎麼做研究？同樣的一份資料，可能國民黨黨史會做的解讀，跟例如說臺灣史專家做的解讀是不一樣的。怎麼樣去做這些歷史的解讀、檔案的分析？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意義如何被建立，意義如何被抽取出來，大家立基在什麼樣的座標上？檔案的解讀其實會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其實從事轉型正義的歷史檔案解讀，必然是從民主化以後的政治價值座標出發，給予評價。它就是一個評價的工程。我們不可能說，好，檔案通通攤出來，在這邊你自己看，你看了以後自己就會有答案。不會，有的時候，光看是不會有答案的，或者我的答案跟你的答案不一樣。轉型正義其實就是一個重新評價歷史的工程。必須要先建立價值座標，這也是為什麼會提到，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必須要脈絡化，必須要歷史化，還要在民主演進的過程中滋長出來，才能當作價值座標，因為這是臺灣社會奮鬥出來的結果。

所以說，去討論說是不是要有一個專責機關，或者是分散由人權館、國史館、檔案局各自去做研究？這都還是次要的問題，而是說我們今天除了徵集檔案、公開檔案之外，要去研究跟評價這些從檔案出來的資料。像心理療癒也是一樣，我們曾經提醒過，不要變成個體化和病體化。轉型正義的工作其實是社會工程，有的時候心理療癒會變成只有單一受害者，或者個別的受害者，他受害，但社會其他人覺得無感。結果變成社會大眾覺得，好，那你去治癒那個受難者就好了，去療癒受難家族就好了，跟我有什麼關係？結果就變成轉型正義不是社會整體的責任，而是個別加害者的責任，不是社會整體受害，而是部分受難者受害而已。許多人就會撇清說，我不是受難者，白色恐怖與我無關，我也不關心。因此，我們說不要過度地個體化，不要隔離化。其實轉型正義在提醒大家的是，國

家暴力施加的對象絕對不會只有政治受難者跟家屬而已，是整個社會集體的被政治暴力凌駕。所以當在戒嚴時期大家默不作聲，看到別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選擇遺忘，這本身也是一個需要被 rehabilitate 的工程。但是當你把它個體化、病體化、隔離化之後，反而造成的社會其他人對白色恐怖更加的無感。

最近在司法官學院上課的時候，有一位學員就提問說，其實他跟家裡人討論，他們並沒有覺得戒嚴時代有什麼不對、不好，甚至不覺得那時候跟現在有什麼差別。我的回應是，如果你問一條魚，什麼是水？它可能回答不出來，因為它從出生後就是在水裡。一定是要把那條魚挪到別的地方去，例如說把它撈上岸之後，它才會覺得說原來那個環境叫做水。現在的台灣社會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脫離的過程？就是離開戒嚴狀態的一個情境？還是說還在「水裡」，沒有被撈起來過？可能對很多家庭，對很多臺灣人來講，他覺得是延續的，甚至可能是懷念的。這也是我們在談論到底過去這幾年轉型正義工程是否成功的一個角度。社會上對於這些事情的評價有沒有改變？

拉里拉雜的講很多，但是還有一些還沒有講完。剛一開始講了，我的角度可能跟前面兩位不太一樣，當然也不是針對兩位，就是從整體的政府，從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馬英九時代到現在蔡英文時代快要結束了，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歷程，我們少了一些什麼？我們可以做什麼？那有些人會覺得說民間社會還是很重要。包括剛剛所提到的這一些問題，國民黨問題、共產黨問題、蔣經國的問題，如果民間社會沒有自發性的去做一些討論的話，光是從政府的角度來去看，或是去做，總是會有一些侷限。我就先講到這邊，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好，我們謝謝黃老師提供給我們另外一個面向的，這個意見高見，這都是一些很值得我們深思，而且值得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方向，來反省我們的轉型正義工程。那麼我們今天的座談會第一個階段由三位與談人各自發表 20 分鐘的意見，就到這裡為止。那麼接下來的時間是開放問答的時間，開放互相討論的時間。請問三位與談人有沒有互相要回答其他與談人的問題的地方？沒有嗎？那我們是不是把時間留給現場的與會貴賓？或者與會的各位來賓，有沒有要對剛才早上的分場，以及下午的分場的發表人，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那既然沒有人要提出，我先算拋磚引玉。剛剛提到三位與談人各自從各自的位置，來談一些轉型正義工程，到截至為止，不管是成果也好，碰到的問題也好，或者是對未來的展望。那對我而言，因為我所在的位置是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我們處理的就是不當黨產，不當黨產歸在誰名下的不當黨產？是威權時代的政黨，以及政黨的附隨組織。那麼剛剛我們三位與談人都有提到，那個政治檔案，檔案的徵集跟公開。那我們知道，像剛剛黃老師所提到的，國家全體人民對於過去這一段威權統治的認識，或者說像黃老師所說對於某個政黨的看法，我想都很重要的有一個觀點是什麼？關於到檔案的徵集跟公開。那譬如說以我們黨產會為例，我們黨產會處理的對象其中一個附隨組織叫做婦聯會，好，現在有一個問題，婦聯會儘管在他前任的理事長已經銷毀的 170 箱重要的資料以外，我們所拿到的資料裡面，有婦聯會歷年來各個分會，包括總會會員的名單，更重要的是什麼？各級幹部的名單。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可能依照現在的法治，我要是公開了，我可能違反個資保護法，

我會被告。那因此這個也影響到，我相信也影響到該管的機關的公務員，處理這件事情態度。

可是問題是這樣，從我們的研究顯示，我們的研究顯示，婦聯會的這一些幹部，他的更替，就是說哪一位太太、哪一位小姐她擔任婦聯會裡面的一個理事、監事，往往是隨著什麼？往往隨著國民黨黨內政治地位，個別政治人物政治地位的陞遷，這個甚至於被貶，造成他們的太太，或他們的女兒在婦聯會內部位置的轉變。所以你說譬如說像這樣的名單，它是不是政治檔案？在我來看是。可是你可能從別的標準來看，它又不是。那我覺得是像譬如說我舉以這樣的例子，就證明說，這其實是整個國家大的轉型工程裡面，一個你可能可以說微不足道，一個小小的一個事情，可是整體整個國家的面臨到轉型正義的問題就是這麼龐雜，單單一個小問題，就可以吵很久。那這是我個人提出來，我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問題，拋磚引玉，供各位貴賓參考。那在座的有沒有？這位女同學先舉手。

聽眾 2 一女：

我叫黃脩閔，我是臺大法律公法組研究生，然後我主要想問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是關於上一場分場的論壇的時候，徐老師講的主要是文化資產保存法裡面，可能涉及到一些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其實。

主持人—許有為：

對不起，就打斷您一下，其實徐老師他下午有會議。

聽眾 2 一女：

但跟剛剛講的是有連結。

主持人—許有為：

OK，好。

聽眾 2 一女：

所以我不知道問徐老師？

主持人—許有為：

好。

聽眾 2 一女：

然後其實這一場剛剛處長也有提到，就是針對不義遺址的那個做法，可能目前是採取要往專法的方向走。那我自己是很好奇說，那如果我們從法律的層面看，那到底是在文化資產保存體系開始納入一些轉型正義的觀點，因為其實文化資產裡面也有一些歷史建築，或歷史意義等等的這個概念進去比較容易，要文資委員具有轉型正義的視野比較容易，還是我們推專法比較容易？雖然這看似好像是一個到底要走文資法，還是要走專法的一個，好像法律細節瑣碎的討論，可是我會覺得既然現在不義遺址，很多都已經面對快要被破壞等等很嚴峻的議題，那到底走怎麼樣的途徑，更快更能夠解決問題，就會是我現在很在意的。因為不義遺址也跟轉型正義的教育有很大的關聯，它可以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底，所以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然後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剛剛黃老師有提到很多我們，當我們今天想要都透過法治化等等來解決，可能沒辦法真正的達到可能社會的對話，還有一些對於轉型正義應該要核心去解決的問題。那我自己一直在想是，像我們這一代，或是我們很常在提到，都會說為什麼我們會有很深的黨國思想或什麼，都會歸結到可

能是因為我們上一輩，就我爸媽那輩從小受的教育，影響到對待我們的一種教育的方式。那也是因為這樣，所以現在其實無論是國中小學等等，其實都已經開始很積極的把轉型正義教育納入一個重要的環節，他們等於是多很多對話的機會，因為今天教師他也必須要學，然後今天學生他也必須要學。可是就像最近校園內外發生很多爭議，即使推了很多性平教育，即使推了很多原住民族教育，最後還是有很多歧視的問題產生。那我想問就是在目前推的轉型正義教育，到底要怎麼樣落實，可以讓它真的是落實雙方的對話，而不是淪為一種，好像也是某種政治正確的口號，而大家沒有真正的吸取教訓，或是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這是在轉型正義教育這部分，在社會對話特別想要好奇的部分，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那您主要是要請教哪位？

聽眾 2－女：

我想問，可以問，我想主要想第一個問題主要想問處長，第二個問題主要想問黃老師跟處長，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處長被點兩次。連克先生好像也有問題，是不是一起？

聽眾 3－連克：

好，謝謝主持人。那因為那個徐老師既然有點名到我，就想說順便做個回應。而且因為就是上一場的主持人並沒有給我回應的時間，我覺得一併說明一下。就是我個人覺得就是我認同老師你的

觀點，就是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工作，但是我，所以就是因為與時間賽跑，其實我在聽完的評論裡面的意見之後，我個人認為可能行政機關就有主動調查的必要，因為行政機關又不是法院說不告不理，然後那個當事人要受理申請才開始展開調查。再加上其實它只是有一個長期的基礎，就是二十幾年前就有 228 基金會，或者是補償基金會在受理這些，就是被害者的申請，那其實是有一個基礎的，所以在當初訂定所謂的權益維護條例的時候，也才有所謂的差額請求權的相關的規定。所以我認為本來就應該主動調查。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調查，不單純是為了賠償給家屬多少錢，更重要是我們國家對於我們現在到底沒收了多少財產，始終是不清不楚。二十幾年前補償基金會在發函給國防部的時候，就只拿到一張判決書跟資料的案卡，國防部說我們已經沒有檔案了。結果經過二十幾年的政治檔案清查，竟然查出了這麼多檔案。那我更擔心的是，補償基金會不夠公權力的原因是，萬一他再發函國防部，要求沒收財產處理委員會檔案，國防部還是告訴你不好意思，沒有檔案的話，該怎麼辦？以上只是簡單的回應跟詢問，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處長，現在累積的問，我們先解決前面的問題，先請，不然先請處長先行回答，然後黃老師，然後徐老師這樣好不好？

與談人 1－賴俊兆 Semaylay i Kakubaw：

謝謝主持人許委員。先針對剛才徐老師及黃老師很受用且重要的提醒稍作回應。本人有機緣在政府部門從事人權及轉型正義工作，個人覺得幸運也很珍貴。今天為什麼特別用國家任務角度談論

轉型正義？除確實為本人目前工作外，同時也回應如何透過法制、政策及部會分工捲動這項工作，也不僅是黃老師剛才所提醒的社會溝通，這一年工作過程中，細節不便在此談太多，因為會有點像抱怨，但在座例如黨產會同仁或在其他公部門服務的同仁，大概不難想像，譬如前階段促轉會時期執行許多任務，但若問促轉會以外公務機關，可能很多人都會搞混促轉會與黨產會兩者。

雖然剛才提到這一年 6 個主要部會的工作成果，但其實不是為了美化或吹噓政府現在作為或相關數據而已，而是如何捲動公務部門，譬如透過接下來法案的提出。也贊同徐老師提到這些法案不能代表一切，但提出來還是會帶動討論，不管提出的立法方向或規範內容，希望能成為大家討論的材料。在討論過程中，也未嘗不是另一種社會對話及彼此溝通的過程。現階段看到的法制部分，確實有這個需求，也回應社會對於轉型正義工程的關注，像徐老師提及文化部業務何其多，若文化部願意在立法方向擬具不義遺址保存條例的專法，且能達成法制化，也代表不義遺址保存將在文化部整體文化業務佔有一席之地。

其他轉型正義業務雖然現在是朝向部門化的方向架構，其實也希望公務部門開始捲動起來，不管透過法律明確課予機關任務或法定義務，甚至剛才老師所提到的課責等，同時也會有一些公私部門間的協力，例如不義遺址保存或轉型正義教育，所以如何使社會大眾在接下來的各種階段，如法制討論或相關工作推動階段，譬如大家關心的中正紀念堂轉型。這些契機使大家好好回顧過往歷史是如何發展成現況，例如許多威權象徵、街路名稱等均其來有自。討論過程如同黃老師提到透過很多不同方式不斷反省，又譬如大法官解釋的論述或類似今日的學術討論，均相當重要，這些論述的累積，

當然也是轉型正義推動必要部分，在接下來的階段，希望政府機關及政府各部會之間，包含本處，就其法定任務開創各種機會進行各式各樣的社會溝通與對話，這是我們目前想像的方向。

以近期臺灣社會為例，若無一連串 me too 事件發生，即便性平議題在臺灣已討論許久，但討論熱度可能不會像近期如此熱烈，甚至明確的修法檢討進程都出爐。個人也蠻期待轉型正義亦復如此，因為轉型正義畢竟與臺灣的民主鞏固、人權實踐息息相關，希望也有這樣的機會使大家關注轉型正義議題。

稍微回應一下同學提問。在不義遺址保存上，前階段在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也多所討論，該報告為一階段性建議，但在先前不義遺址是否納入文資或分開處理討論之中，剛才徐老師有做脈絡分析，目前以文化部提出的專法草案，在行政院審查階段較大的立法方向應該就是使不義遺址不用受限於文資的各種分類，乃至於中央及地方的分工架構。不義遺址較可獨立處理，其定義上大致與目前促轉條例所提到的範圍接近，如此不至於陷入文資架構中如何分類之困境，將其獨立規範，相對而言較為海闊天空且賦予其特別法律定位。

後續相關機關的任務，基本原則為先公後私，在這部專法內會課予公部門較為明確化的任務，譬如促轉會時期所審定或後續文化部透過這部專法審議機制所審定的不義遺址，公務機關對不義遺址即有進行相關活化及保存的義務，而在明確課予法律責任後，相對而言較可能推動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的相關場址。所以目前立法方向前經促轉會時期的討論，與後來文化部內部討論後，決定朝專法方式處理。

第二個有關轉型正義教育的問題，前面已稍做說明，雖後續修

法希望使其明確化，但在此之前，則以行政院核定的國家推動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為之，該綱領雖未如入法明確，但現在很多轉型正義的工作推動，如同黃老師所提，法制化非一定絕對代表一切。目前轉型正義教育將一般公務員、軍警情報機關、學校、一般社會大眾皆納入，現階段即便未法制化，只要機關間妥適溝通即可行，促轉條例規定轉型正義教育主責機關為教育部，但在行政院核定的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擬訂過程中，包含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如國防部可能也是重要對象，即討論如何使該部願意或最終納入，甚至在跨院際部分，例如考試院主管一般公務員的培訓，尚可透過相關行政協調方式，在尚未法制化之前，透過計畫或綱領等方式推動。目的不外乎希望以此明確要求公務部門確立目標，也許先求有，再求量變，最後到質變。這些捲動可能就是透過相關政策、計畫、法制等方式，使社會大眾更加認識轉型正義的意義與價值，以及與歷史的關係等各方面，希望可以使大家對於轉型正義比較不會抱持事不關己或認為過去式的角度看待，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謝謝賴處長。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請黃老師？

與談人 3 —黃丞儀：

我覺得如果轉型正義變成是「莒光日教學」那樣的形式化的話，轉型正義就死了，就終結了。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如果學校安排一些教育課程，變成像是在公務機關被要求去上資訊安全教育三小時的規定，不然就會被懲罰，像這個方式的話，就是流於形式。再次強調怎麼樣去討論很重要，因為很多國家在做轉型正義，其實是在民主化之後立刻從事。為什麼要立刻在民主化之後去從事？關鍵

點是，在那個當下，其實大部分人的觀念是混淆的，他的價值座標還是在威權共黨時期的那個價值座標。所以在 1989 年之後，東歐變天、蘇聯解體，趕快去做這件事情，是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價值座標。但是臺灣沒有。可是我剛剛說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是透過一個一個的事件，慢慢地建立起來，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就已經知道集會遊行的重要，言論自由的重要，公平選舉的重要，其實轉型正義的工作我們已經完成一大半了。因為在過去那些國家，除了透過過去挖掘真相，達到和解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建立新的民主法治價值座標。而這點台灣雖然在九〇年代沒有透過轉型正義工程去完成，但大體也陸續建立了。

這一個部分我覺得是我們現在在推動轉型正義教育的時候，可以多著墨的，也就是可以跟人權教育結合在一起的，讓年輕世代去了解，當你知道為什麼臺灣人會有言論自由，臺灣人什麼時候開始有集會結社自由，看到過去一個一個事件，他自然而然就會去反省說，那為什麼這些沒有發生在民國 60 年代、民國 50 年代、民國 40 年代，雷震案的時候，彭明敏、謝聰敏有沒有受到這些憲法權利的保障，自然而然就會去反省，而不是說政府強迫你要去背誦，強迫你要用特定的方式來記憶某一段政府希望你記得的歷史敘事。另外一點就是，我覺得教育很重要的是，要能夠培養同理心，同情跟理解。我這幾年來的心得是，在做轉型正義工作的時候，其實並不是要把一方變成是萬惡的對象，如果是這樣的話，社會溝通是不可能的。有一方完全被你排除在民主政治體制的社群之外，他也不會有意願要進行溝通。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那是一個幽微的情境，我們要去理解在當下，行為人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除了理解跟同情之外，就是前面第一點強調的，帶著民主化之後的價值座標，再去給予重新評價。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謝謝黃老師，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請徐老師？是。

與談人 2－徐偉群：

好，我可能是先回答一下剛才關於那個財產返還的事情。那個其實那個主動職權調查，還是接受申請調查，它的制度設計是會需要考慮，就是工作者他到底什麼工作？然後講的是說如果我們真的用所謂職權調查，它可能耗的時間可能會更長，它可能會更慢，因為沒有頭緒。可能從沒有頭緒到理出頭緒說，我該追哪一件事情？去找到一個需要被訪談的對象，這是完全沒頭緒的情況下，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尋找，進度會更慢跟，就是就跟時間賽跑來講，是一種更不好的情況，這是為什麼會去設計成的所謂的申請制，這沒有絕對的問題，而是說那個現實上這個操作的可行性。我們去想像一下，一個真正在承辦案件的人，當他去埋入一堆資料，要去找線索的時候，如果沒有任何人給他的一個方向，他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夠理出頭緒。那這就是回答說，為什麼制度設計上設計成申請制，而不是職權調查。但是要請注意就是說，不是他沒有調查權，不是。我當我收到申請案的時候，我為了釐清裡面的事實是什麼，我是可以動用調查權的，這個是這個法制設計的原理這樣。

那我想我就還有一點時間，我就再回應一下。我非常同意就是威權統治帶來的這種人權迫害，是一種整體的受害，全部的人的受害，整個社會的受害。那轉型正義是整個社會要去做價值的反省跟翻轉。但是這個整體性的意義，應該不會變成讓轉型正義成為一種去人化的轉型正義。意思就是說，不太可能切斷具體的個人去談整體的轉型正義。不管從哪一個角度，從被害者的角度，從加害者

的角度，不可能沒有具體的人而去，真的去產生那個關於轉型正義的敘事。那包含什麼？包含說大家要對話，其實誰去啟動對話？這裡就有具體的個人，他不可能是去沒有個人的。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去驅動人去產生對話？尤其我們這邊的議題是要求國家去做轉型正義，那是國家是什麼？你知道國家去啟動對話，國家是誰呢？最後已經被落在具體的機關，或者是人的身上。

所以接下來問題是說我們期待國家去做轉型正義，那根據什麼去要誰去啟動這個對話？其實沒有法律的狀態是不太可能的。那所以這法，所以我還會認為說法制不是充分條件，它是必要條件，就是這個意思。那麼再來就是說，我們講的法制，當我們講法制的時候，就我的理解，我們對於那個法該如何訂這件事情，都會考慮到正當程序，都會考慮到法律設計的時候，要符合我們所謂的法治原則，要放進這些法律條文裡面來。那麼如果一個法制已經放進了這些法治國的元素，在這個情況之下，還要把它理解成是法的暴力，用這個方式來理解它是一個法的暴力的行動，那我就懷疑說，那我們還有任何法治可言嗎？我們還有任何的正當的法治可言嗎？這是我相信法的背後一定有暴力，對不對？就是即使是符合法治國原則下的國家的法，它要最後貫徹，它最後都會有一個暴力的擔保，沒有錯，但是如果用這個觀念去詮釋這個轉型正義中的法制工作，我想可能是放錯了脈絡，因為我們不可能全盤否定法的存在。那法只要存在它要被落實，它背後當然會有暴力機制。那我們講的轉型正義的法治，也當然是在這個脈絡下去訂的法治。

那至於這個法制會不會成為一個政黨的暴力，就要看這個法律怎麼訂。那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說不要有法律做基礎，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讓所謂的國家，也就是實際上某一個執政的人，去推轉

型正義，這不是更危險嗎？這個才更有黨同伐異的可能性。好，這是我所說的這個法制工作的意義，對我來講，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好，我們謝謝徐老師的回應。那剛剛好像後面還有貴賓要？請。

聽眾 4－男：

我是郭俊毅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那這邊有幾個問題，這兩個問題簡單想要跟處長請教一下。第一個就是說未來整個檔案徵集的工作職權會是由人轉會這邊要去協調負責，但實際上的狀況就是，如果機關不願意提供檔案那要怎麼面對？比方說過去徵集過來的調查局的檔案，他就只有第三處提供，那其他處，甚至很多非編制內的單位，他們不提供這些檔案，那這可能也不只是調查局，那包含國安局也是，等於說他們以各種國家安全，個資為理由，不去提供任何的檔案，但是對於歷史研究來講，最根本的是對於這些檔案的解讀，這些理解要怎麼去面對，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關於加害者的一個追究的狀況。就我最近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實務上接觸到一些所謂的調查員過去的調查員，但實際面臨的問題就是他們都不斷堅持，他們自己當時是依法行政，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錯，那如果你要針對某些個案，或是針對某些特殊狀況要去跟他們做討論，他們誰都不願意提供。那在沒有這些歷史事實的情況底下，我們也很難去針對他們去定罪去究責他們的責任，那對於加害者來講，我們應該要去如何面對，就是他絕對不會

僅僅是說我一個公文發過去要他講話，他就講。促轉會的結案報告裡面其實就有這樣寫，然後你調查了軍法官，調查了很多的調查員，但實際上能得到的有限。那在未來整體的，可能透過法治也好，或非法治也好的對於加害者的追究，應該要以怎樣的方式去面對，想請教一下處長的看法，謝謝。

主持人－許有為：

謝謝。是不是請處長？如果沒有其他問題，我們先就先請處長。

與談人 1－賴俊兆 Semaylay i Kakubaw：

謝謝提問，但可能無法完整回應，因這兩道問題分別涉及政治檔案徵集審定與加害者識別、處置事宜，前面提及屬部會權責。有關政治檔案徵集審定部分，依政治檔案條例現行規定，在立法通過後就開始相關政治檔案的徵集審定工作，政黨政治檔案的徵集則仍待努力。所詢問機關部分，若理解無誤，可能是先前相關機密核定上，倘依現行規定，譬如列永久保密的，如國安情治單位可能就不會被納入政治檔案徵集審定範圍，或者不會隨同移轉，縱然可能是政治檔案，但不會移轉予檔案局開放應用。前面提及政治檔案條例正在進行修法，若依目前行政院就國發會所提修正草案討論方向，後續針對解降密部分將搭配國家機密保護法有關永久保密規定的修正。經檢討修正後，相信主責機關檔案局應會再啟動另一波政治檔案徵集。相關解降密檢討及政治檔案條例最小限制、最大開放的修正精神，配合現行政治檔案條例第 8 條 2 項 2 款國安或對外關係的限制規定一併調整後，樂觀看待未來政治檔案徵集審定範圍擴大。

有關加害者識別、處置部分，前面說明著墨不多，具體原因主

要在於此部分為法務部權責，本處仍持續與該部熱烈溝通，希望該部儘速提出專法草案。確實如徐老師所言已有一定基礎，包含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第四部促轉條例全文修正草案提出的加害者專章，實際上法務部在前階段也召開多場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諮詢會議，因此希望這部專法草案不要讓外界等候太久。如剛才說明的整體法制工程，可能外界仍相當期待加害者識別及處置事宜的推動，也希望能一併在整體法制工程中，法務部可如期提出。因此有關加害者如何識別、識別要件、主客觀要件、後續如何究責、是否追究刑事或行政責任等事宜，可能待法務部專法草案提出後，轉型正義之加害者應如何識別及處置，屆時較為明朗。

主持人—許有為：

好，我們謝謝賴處長。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我們想研討會就進行到這裡為止。那各位同學，各位與會來賓很高興很歡迎大家，謝謝大家今天來到這裡，參加這一場研討會，那我在此就宣布這一場研討會圓滿結束，謝謝各位。